

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社会凋敝、民主政体混乱不堪……美国即将走向衰落？

谁能力挽狂澜？

是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抑或是奥巴马？



THE SQUANDERING OF AMERICA

How the Failure of Our Politics Undermines Our Prosperity

大国的陷落

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

[美]罗伯特·库特纳◎著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HE SQUANDERING
OF AMERICA

How the Failure of Our Politics Undermines Our Prosperity

大国的陷落

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

[美] 罗伯特·库特纳◎著
曾贤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的陷落 / (美) 库特纳著; 曾贤明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5

书名原文: The Squandering of America: How the Failure of Our Politics Undermines our Prosperity

ISBN 978-7-5086-1496-0

I. 大… II. ①库… ②曾… III. 经济政策－研究－美国 IV. F1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668 号

The Squandering of America: How the Failure of Our Politics Undermines our Prosperity

Copyright ©2007 by Robert Kuttner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大国的陷落

DA GUO DE XIANLUO

著 者: [美] 罗伯特 · 库特纳

译 者: 曾贤明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1462

书 号: ISBN 978-7-5086-1496-0/F · 158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经济失序的根源

自建国以来，美国人就生活在一个倡导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国度，这是何等的幸事。建国之初，虽然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但美国理念仍成为引领他国前进的明灯。20世纪，锐意进取、视野开阔的美国，逐渐确立在全球睿智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内，制度更民主，社会发展更和谐。为了大众利益，国家政策鼓励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创新，同时大力驯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破坏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繁荣，为大众提供切实的经济保障。

今天，美国在诸多领域对资源大肆挥霍和滥用。检验一个制度是否民主的最终手段，是看在这种体制下，民众能否将执政党撵下台。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快要丧失我们理应享有的民主权利：这不仅表现在规则和选举被人操纵，还在于富人主导政治，民众参与力度逐渐下降，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不时受到侵犯。

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被我们政府大肆滥用，业已式微，全然不如从前。我们政府奉行的政策不切实际，不仅未能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没有推动民主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的发展。相反，政府却在利用外国威胁，削弱国内民众的自由权利。乔治·W·布什主导发动的中东战争深陷泥潭，这无疑使国内每况愈下的局势雪上加霜。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本该和美国军力相得益彰，共促和平，但乔治·布什无视全球的和平愿望，肆意发动战争。他所推行的政策，总体而言，没有让美国成为启迪思想的圣地，反而引火烧身，成为世人讨伐的目标。

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挥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知名专家预测，全球海平面正在逐渐上升，鱼类濒临灭绝，热带疾病肆虐传播，极端气候不断加剧，然而，此时此刻，美国却对发展其他燃料不屑一顾，继续利用化石燃料；面临随时

可能降临的灾难，美国拒绝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缺乏防范灾难于未然之心。

我们没有大力去发展能确保我们社会各层面稳定、繁荣的经济潜力，反而把赌注压在金融投机活动之上。然而，投机活动所获的利润却流进极少数精英分子的腰包，这不仅危害总体繁荣的局面，还严重削弱了我们的清偿能力。不到 10 年，因税收削减，美国国库以前充盈的储备，不但被耗费殆尽，还让我们背负巨额债务。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及所欠的金融债务，已超过美国所能承受的合理限度，其数额之巨，极有可能引发美国经济的崩溃。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些极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趋势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民主政治的失败，民主政治框架下应负责任的领导人和政府机构难逃其咎。但是，只要政府敢于创新，领导有方，我们仍可以扭转形势，化解危机，避免灾难降临美国。

我们挥霍着美国的大好前程，这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如若全都写出，一本专著显然不够。因此，本书只着重探讨其中一个大方面：危险重重的美国经济与式微的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

被挥霍的经济

美国总体繁荣之方方面面的挥霍现状，与个人和体制所面临的急剧上升的经济风险之间，存在一个共通点。将这两种趋势联系在一起的共通点，就是这样的现状：过去和谐平衡、治理有序的资本主义体系正趋于瓦解。造成这种现状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一小撮经济精英分子。反过来，在资本主义体系式微的过程中，民主政治体制自然遭到极大的削弱。多数人的生活标准逐渐下降，经济体系面临的整体风险逐渐上升，因此，本书将着重谈探讨这种政治动态和经济风险。最后，为了逆转这些密切相关的发展趋势，本书末尾给出了我们应如何应对的建议。

布什总统任职期间，美国整体上还算殷实的资源不断被挥霍滥用，清偿能力日趋下降，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此后 30 年来，美国的经济总量甚至已翻番，但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却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两人的收入仍维持原样，或在下滑。过去由私营企业主和社会福利机构买单的医保和退休养老风险和成本，已转由个人和家庭承担。近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劳动者面临失业及因业务外包而带来的威胁，收入不断下降。在这 30

年内，美国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开始工作挣钱，她们的角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缺乏社会福利机构的资助，美国家庭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年轻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处境尤其不利，因为他们的收入要用来供房、偿还学费贷款，还要缴纳医保，结果往往入不敷出。为实现收支平衡，美国人就得坐吃房屋净值维持生计，因此，美国人的消费是建立在债务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的。

天真的评论家，往往期望通过政治辩论探讨所有这些课题。然而，尽管经济问题就在眼前，我们的政治体制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而且可以说是毫无作为。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解决方法的。不错，在民主制度更健全的时代，我们的政治体制曾非常有效地解决过类似难题。但如今，美国家庭面临的多数经济困境问题，却不在辩论会关注议题之内。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反过来，这也正是导致政治体制日益式微的原因所在。

这种危害既给个人，也给家庭带来挑战；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面临的整体风险空前巨大，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服务于企业和员工的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机构投机博弈的棋子，其胜算概率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推行的贸易政策，更是肆意破坏美国制造业，造成结构上的永远失衡：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工作机会转移海外，我们只得大举外债，因为我们无法再依靠出口来获得所需的融资。

为弥补不断上升的贸易赤字，美国对外（尤其是亚洲央行）发行公债，陷入空前的债务泥潭。受贸易逆差和外债拖累，美元价值迟早将面临大幅贬值的危险。如果贬值突然在经济崩溃中发生，这势必引发更大规模的经济损失。即使这种危害是逐渐侵蚀国民经济的，而且，我们也委婉地将这一切称之为“软着陆”，但是，这仍然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标准将进一步下滑。对外债务问题是亟须关注的国家难题，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议题却被政治讨论排除在外。两个党派、华尔街多数机构，甚至美联储都对这个议题轻描淡写，强装从容。这是政治策略的又一个失败。

取消对金融投机的监管措施，不仅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还会加剧经济崩盘的风险。2000年1月，股市发生崩盘，但我们竟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随后，政府进行了极为谨慎的股市改革，要求银行和公司秉持诚信的会计原则，但他们为此抱怨不休，不过，这些机构很快就发现了新的规避手段，继续从事非法的财务操作。

溯本求源

政府未能妥善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政治体制失去应有的职能，这与民主政体落魄破败的现实是如影随形的。不推动公民投票权，反而花更多精力予以压制，一个多世纪以来，布什政府的这种举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严肃认真的美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最近两届总统选举的结果是非法获取的。因为富人排挤公众参政，所以民众就会抛弃政治，远离政治。

当政治不能急人民之所急时，人民就会对政治失去兴趣。抑或，在他们看来，政治主要是文化之间的斗争、以爱国主义之名发动战争的托词，甚或政治与他们毫无关系，根本就是其他人的事。造成个人经济问题的原因，似乎是个自己，而不是政治。那些面临最严峻经济压力的民众，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远离政治。

反过来，因为大众逐渐远离政治，所以民主制度缺乏生机，黯然失色。因此，当一个独裁政府无视权利和法律，凌驾于宪法规定之上杜撰声明，如总统“签署声明”，利用持久的战争状态削弱自由辩论的权利，伙同其他利益集团，压制我们最基本的投票权，无视每票都重要的理念，民众发表不同见解的声音就几乎归于沉寂。这就是公正社会和民主体制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真正原因。

本书试图弄清各种因素，并找到最终答案：着重探讨曾带来社会整体繁荣的手段，是如何从国家政策和公开辩论中被弃之不用的；我将为大家解释，精英主导、反过来又服务于精英的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后果？我们的社会，不仅更不平等、更不民主，还更容易遭受整体风险和冲击，经济效率更低下。接下来，本书将深入分析政治方面的障碍因素及其应对方案。

面对当前的情形，我们还有其他相应的应对方案。我们需要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思想体系与和谐的政治体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需要政治领导人具有坚定的信念，也需要一套更强有力的民主体制，从而起到制衡金融精英权力的作用。在二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混合经济模式曾是我们政府推行的政策，这也是我们大众政治焕发勃勃生机的原因所在。这种经济模式曾成功地实现社会各层面的整体繁荣，同时，国家制度和个人生活得到了极大保障。与当前广泛存在的认识误区相反，新经济机构无法妨碍我们重建确保社会繁荣和保障民众生活的经济模式。但首先，我们得改良我们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的成功

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失败，意味着另一个人将在政治中春风得意。本书描述的多层面的职能失灵，可视为政治职能的失败，也可视为政治职能的成功之处——这取决于你的身份和你对美国未来的期望。美国多数民众的生活标准不断下滑，这一事实应理解为政治上的失败。但对于金融精英而言，这种现状对他们极为有利，是他们在政治影响力上的成功体现。

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自 1973 年来，美国人在经济上举步维艰，实际收入未见增长，个人财务风险却不断上升。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却成为 10% 的有钱人大发其财的黄金时期，对于 1% 的权贵们来说，情形更是如此，超级富豪自不必说。在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繁荣，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但总体而论，这个时期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多年那样，为普通美国人带来切实的经济收益。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评论人士将原因归于如下几类：经济体制的变革；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转型；全球性竞争加剧；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大量上岗工作；妇女获得经济上的解放；移民蜂拥而至美国；社会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诚然，这些因素的确能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在这样一段生产效率快速上升的时期，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停滞不前，但是，有些人只盯着技术层面的经济因素给出解释，事实上，他们看错了方向，给出了错误的解释。

以稳固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并没有自发腾飞，而是政府推动的。

本书认为，民主政治在多个层面的失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现状，从根本上说是两派政党所致。围绕诸如预算平衡和税收减免的问题，民主党人内部也曾争论不休，但太多的民主党人一心从商，因此，在调控型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崩塌的过程中难逃其咎。过去为我们带来社会的整体繁荣，既为个人也为整个体制，提供更大保障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成历史。

美国两党都要倚靠有钱的捐款人慷慨解囊，希望获得最大的财力支持；竞选费用也与年俱增。有些有钱的自由党人，似乎赞成对任何议题都持自由观点，但唯独对如何调控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核心问题只字不提。

在投资银行家云集的派克大街，我曾参加过民主党人的筹资活动。在那个地

方，对于推动人权、亡羊补牢的措施及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他们的热情总是空前高涨，却毫不谈及金融监管或社会福利投资。靠联合企业资助的民主党人自称新民主党人，而他们却建议民主党派回避一切有关阶层的议题。

曾几何时，代表进步的政党政治深深根植于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之中，如劳工运动。当前，动员民众参与民权和政治活动的组织，已大不如从前，甚至还没有 100 多年前的社团富有生机。反观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精英阶层，我们会发现，他们如日中天，从没如此强大过。只要花一个星期，在华盛顿附近的酒店走上几次，你就会发现，那边举行的会议之多，难以胜数：贸易和职业协会、公司企业和商业游说会议，反正，你能想到的会议，这里都有。这一小撮美国富豪精英们个个忙碌不堪，交游甚广，组织甚好。

富豪精英并非从没关注过大众利益。美国共和党是种植园主阶层创建的，他们深信民主价值观，希望提高大众的日常生活质量。许多美国金融界人士，也曾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在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 1890~1913）^①，贵族采取一切手段攫取财富，但出于对大众谋利的考虑，贵族改革派对强盗式资本家进行了成功的制衡。接下来开展的很多改革，正是他们努力的结晶。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著名的背离自己阶层的阶级“反叛者”，支持他出台新政的诸多同僚莫不如此。直到 20 世纪尼克松执政之前，美国出现过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进步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全民医保，倡导更严格的环保法规，甚至主张保障劳动者的年收入。共和党人过去也曾大力监管财政预算开支。如今的政客大多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税收优惠和股票期权问题，关心国计民生大事的共和党人，还真是难找。

相反，从表面上看，两党的金融精英疾呼忧国忧民主张，他们断言美国联邦社保和医保计划正面临破产。以“大国的陷落”为标题的本书，其实也可专谈“应得权益计划”的严重威胁。事实上，探讨这个主题的著作，市面上有好几本。但是，这些精英的“疾呼”只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把美国最后所剩的那点社会福利投资都统统免除。与对外举债和以投机为基础对经济放任自流所带来的真正危险相比，弥补联邦社保与医保所需缺口，则是相对容易

^① 在美国的进步时代，美国的强盗式资本家，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业或金融界巨头，他们靠利用令人怀疑的手段对股市进行操纵、剥削劳工等不道德的手段发财。——译者注

的任务。

政治体制造成的此类职能失灵，在美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但的确发生过。建国之初，面对千疮百孔的奴隶制度，共和国领导人数十年都没有找到妥善的应对办法，直到美国内战爆发后才最终根除这个恶瘤。随后，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美国局势更是一片混乱，情形甚至比内战前更严重，因此，又过了一个世纪，美国黑人才彻底地重获自由。

19世纪末期是民主体制无所作为的另一个时期。当时，政府作为堪称全面失败，不仅未能妥善解决产业化过程的无序局面，而且没能挽救逐渐衰败的农业经济。在这段混乱时期，美国不时发生周期性经济衰退，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在进步时代最终推行了部分改革举措。另一个紧张时期，则在一战后，其时，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和同盟国，在战后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中没能达成一致。最后，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相继爆发，所有国家都为此付出代价。相比之下，倒是在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确立了领导地位，有效地应对了战后国内外的重建难题。但从很多方面而言，这次成功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例外。

放纵的自由市场

10年前，我出过一本书，书名是《一切代售：市场的好处和限度》（*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本书可视为那本书的续本。

在先前那本书中，我对市场万能论表示质疑，同时论及市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情形。如今，金融精英人士主宰政治，政府希望称霸世界，普通大众和整体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有鉴于此，我写出本书，以提醒美国大众。两书有共同之处，即呼吁政府对市场化运作适度调控。

《一切代售》描述的具体内容固然比较复杂，但我提出的观点非常简单。诚然，在很多经济领域中，自由市场都行之有效。但在范围广泛的其他经济领域之中，如医保、环保及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调节方面，市场并没有表现得同样出色。如果放任市场自行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为社会大众所不容，而且将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高效是市场受到追捧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可能不想看到市场带来的后果，但如果市场一直是分配资源，并进而成为推动社会繁荣的最有效手段，那么，市

场的优势固然可以抵减其不足。市场自行运作之后，我们总可以再次重新分配资源，为那些在市场自行运作过程中失败的群体施以援手。然而，市场本身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正如我在《一切代售》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样：在某些经济领域，市场能优化配置资源的看法的确不错，但在其他很多领域之内，这种看法就大错特错了。在医疗、研究、教育、污染控制，抑或收入支出分配方面，市场就无法交出满意的答卷。保守经济学家都在大力吹捧交易市场，但交易市场无法对实际资产进行准确定价。

当市场无法在任何时候都发挥高效作用时，我们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方案有很多种。此时，为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和谐分配，为发挥市场本身的效率，我们的政府就需要，也必须作出选择——如何对经济的不同领域进行改造和监管。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我们该选择何种政治体制。如果我们希望把美国建成一个平等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有健全的民主政治机制。我们的民主制衡机构一旦被削弱，富人的权力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从一定程度上说，本书呼吁政府倡导多样化的经济形式。我们无法将经济形式简化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套简明通则。医疗或电力市场与当地农业市场或男士衬衣市场截然不同。将医疗事业推向市场，不加监管，任其自生自灭，有些人就会因为无法得到救治而死亡，病患会被医疗计划排除在外，医生和病患之间由此变为对立的关系，结果，保险公司和医药巨头大发其财，富得流油。如果将电力事业完全市场化，随之而来的情形，就是欺诈成风，秩序荡然无存。如果政府任由金融市场自行发展，优胜劣汰，等待我们的，就是贪腐猖獗的内幕交易和经济的崩溃。

从另一个角度看，为让市场臻于完善，本书也恳请读者将这种过度市场化的观点理解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革命。历经 20 世纪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政治家设计了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后来称之为混合经济的经济形态。财产所有权仍然归私人所有，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放任的市场机制出问题的多个方面，均受政府监管。这场市场的变革被最有力的应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领域——金融市场。政府开始监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经纪行业、股票交易所、会计事务所，以及被视为天然垄断巨头、密切结盟的产业，如公用事业单位。20 世纪 20 年代，正是这些行业与华尔街金融操纵机

构沆瀣一气，欺诈大众，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效率。

由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了经济大萧条，一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精英势力开始式微（后来证明只是暂时式微），因此，这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为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展开的政府监管革命提供了可能性。政府享有极高的威望，这在一个在各方面都倡导自由的国度，实属罕见。其原因在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领导下的美国联邦政府，成功地让人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将资本主义从放任自流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随后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同时，联邦政府为民众提供新的福利，如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补偿、《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①、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的贷款。政府出台的所有这些措施，最终使经历大萧条年代的美国人逐渐发展成为战后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体制受到调控，企业开展得有声有色。普通美国人几乎都没有认识到，这正是调控型资本主义焕发生机带来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制度该如何运行才有效基础理念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在通俗文化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转型的见证人，他们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也功不可没。过去，主流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②，推崇备至。如今的经济学家，则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③，大唱赞歌。需要政府监管的，不仅仅包括市场经济中

^① 又称《退伍军人法案》，是美国在二战后颁布的一部旨在帮助退伍军人更好适应战后和平时期平民生活的法案。法案的颁布实施使得数百万退伍军人受惠，为美国从战时经济转变为民用经济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译者注

^② 亚当·斯密，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1759 年出版了有关人的本性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76 年发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家论》）一书。他是第一个阐释专业化或劳动分工优越性的学者，认为这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使得人们彼此相互依赖，导致市场和价格体制的形成，并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他强调劳动和价值成本相联系，认为在一个自由和竞争的经济中，人类的利己本性，如果无国家的干预，将产生一种能自身发展的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认为国家只应关心公共秩序、国防和某些必要的服务设施，如道路建设。亚当·斯密的学说和著作，对他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尤其对结束重商主义的统治地位和对后来领导产业革命的企业家的行为，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译者注

^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和主编《经济学杂志》，兼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和英格兰银行理事等职。长期以货币数量的变化解释经济现象的变动，主张实行管理通货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主张由国家全面调节经济生活，以挽救资本主义。主要著作有《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者注。

的关键领域；如果任由私营领域供需关系自行调节，就连经济体制本身也无法正常高效地运行。在调控型资本主义市场中，政府有必要对货币和信贷的供应总额进行管控，私营领域及公共的需求总流动性也要予以监管。于是，美联储获得政府授予的管控货币供应量的新使命，同时肩负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重任，并在万不得已的危急时刻担任贷款机构的角色。总统开始利用联邦预算分拨公共开支。此时的联邦预算不仅被作为一种手段，而且还被纳入财政政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向市场注入资金，刺激私营部门的需求，在经济过热时，又适度调控，加以抑制。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通常密切配合，从而确保经济的正常发展。

所有发达民主国家实施的政策都极为相似。在欧洲，企业和雇员之间缓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意识更为明显，涉及范围更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一场市场意识的反革命已在开始酝酿。在二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过程中羽翼渐丰的企业，又重新获得了昔日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石油市场震荡不稳，随后物价暴涨，这招来了经济学家对调控型资本主义机制的不满。曾经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如吹捧完全自由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徒——米尔顿·弗里德曼^①逐渐如日中天，影响力日盛。于是，政府的监管措施受到批判，成了通胀的替罪羊。接下来，企业资助组建的智库大量涌现，保守的知识分子因此有了舒适的容身之地，于是不断完善，并不遗余力地鼓吹这种观点。很多民主党人，也包括共和党人，因为支持这场市场意识的反革命获得企业的嘉奖。结果，支持民主党派的选民——那些普通老百姓——对民主党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到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时，企业势力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保守主义思想盛行，自由派的信心大不如从前，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主政美国政府的。新一代政府着手干的，便是彻底摧毁混合经济形式。

所有这些并不一定会必然发生，甚至也不会更有效率。如何有效调控资本主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著述颇丰（尤其是在货币理论方面），因支持自由放任的观点而闻名。他竭力主张国家对货币和社会福利制度尽量减少控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提出了修正的货币数量论，即为了保持价格稳定，政府应对货币的供应量予以管制，从而使货币与经济增长的步伐相一致。他与妻子罗斯·D·弗里德曼在合著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一书中，要求由私营企业机构取代大多数国营的社会福利服务部门；他还建议，要以联邦补助的负所得税形式，保障每个人的收入。——译者注

义，资本主义该为谁的利益而服务，过去，这是政治问题，现在仍然是。整体上高效运转的资本主义，或许有多种模式，但是，其导致的财富分配结果却会截然不同。

《一切代售》这本书在出版后得到好评。但我当时选择在 1997 年出版该书，时机简直糟糕透顶。刚解除监管的金融市场备受世人关注，发展如日中天。资本市场的管制也被取消，股市价格一路飙升。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情形一样，普通老百姓投身股市，玩起炒股游戏，他们似乎都有必赢的把握。于是，人民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大受吹捧，与以前的情形如出一辙。在调控型资本主义持续崩塌的过程中，“堪比大萧条时代”则成了人们讥讽当前经济时更愿意选择的描述词。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谁又需要大萧条时代的机制来监管银行，为我们提供金融保障呢？市场应该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技术的发展似乎进一步为纯粹的自由市场提供了更新的佐证。一批倡导高科技产业的浮夸预言家，在互联网找到了市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典范和工具。如果说过去的企业垄断曾给社会带来问题，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垄断将再也用不着我们担心。可以料想，计算机平台将把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互联网将发挥拍卖市场的功能，买卖双方自由交易。eBay 这类企业的良好运营说明，市场可自发进行调节。因此，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路冲破 10 000 点，在 10 年时间内，增长 4 倍。与此同时，两位热衷于互联网的经济学家还出版了专著。他们认为，道琼斯当前的合理估值是 36 000 点，这就是新型经济模式的预期发展前景。

到 2001 年时，股市可永远以 3 到 4 倍于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愿景，完全灰飞烟灭。接下来，公众得知，互联网泡沫并非经济评论员的煽情描述引发国人的狂热所致；相反，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欺诈，目的就是让金融内幕人士大量敛财。这是 1929 年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机制及其监管机构的最大耻辱，是从里根主政以来，极少数人开始以牺牲大众利益的方式不断积累财富的进一步延续。

然而，政府却没有对这种现状进行反击，因为，金融精英牢牢掌握了政府。取消市场监管仍然是占主导的意识形态。2000 年过后，华尔街又爆出新的丑闻、监管失职事件，风险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还有民主政治可言，那也是大不如从前，我们以前体验到的那种民主政治已渐行渐远。

我认为，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危险，不仅在于经济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在于美国将面临类似 1929 年规模的灾难性大萧条。关于此点，我在后文中将逐步剖析。如果美国经济再来一次大萧条，毫无疑问，其结果将引发政治体制的变革，

但政治体制却并不一定会因此更为民主。1929年的大萧条成就了英明伟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社会的公共机制因此振兴。在当时的背景下，经济危机没有催生美国版的独裁暴君阿道夫·希特勒，这实在是个奇迹。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期待美国经济再次发生崩盘，从而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蒙受耻辱——如果自由派的政治理念是坐等下次大萧条发生而无所作为，那么他们就会眼睁睁地看着灾难来袭而幸灾乐祸——而是因为我斗胆奢望：事实和论证终究可以改变政治辩论，从而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防范灾难于未然。

驯服资本主义的持久难题

在我写的所有探讨政治、经济的著作中，我总是围绕一个千变不离其宗的大主题展开：要将资本主义打造成服务大众的公正、稳固的经济体系，我们的政治体制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出生于富兰克林执掌白宫的年代，在约翰·肯尼迪总统任期内进入大学深造。我总是以自由派人士的视觉，而不是激进分子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对市场具有的巨大活力深信不疑。当我还是攻读政治和经济学的年轻后生时，美国近期的历史业已表明：借由民主政治体制，资本主义的确是可以被驯服的，并进而服务于普通老百姓。

20世纪50年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年）^①。准确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相互制衡的抵消力量：工会、政府和组织起来的选民，能够制衡、抵消企业巨大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企业自身也有不同利益阵营。对那个时代而言，这不失为高明的观点。然而，当我在为本书展开研究之时，我对金融精英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调查越深入，情况也就越来越明显：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成功地制衡财富越发集中的现象。至今，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自由派人士，而不是钻营阶级斗争学

^①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美国经济学家和著名作家，著有《美国资本主义》（1951年）一书，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他把这种自我调节称为抵消力量（抵制同等力量的力量），因为大公司的经济实力受到有组织的劳工实力（即工会）的抑制。他的另一本书《丰裕社会》（1958年）销量很可观，而书中对私营产业的生产予以的重视不够，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生产是浪费和奢侈的（耗费不合理）。——译者注

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要说，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

本书也让我完全回到了我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我出的第一本书，书名为《富人的叛乱》（*Revolt of the Haves*），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当选为总统的稍早一些时间出版。我在那本书中探讨的主题是“抗税大叛乱”。该事件肇始于 1978 年 6 月，加利福尼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批准了《13 号法案》，由此而揭开了当代各州对抗政府征税的先河。然而，在为《富人的叛乱》作调研准备时，我却发现：事实上，确定财产税征税上限的《13 号法案》并不是要与政府分庭抗礼；相反，这是选民对政治领导力缺失的自然反应，因为，在房屋价值暴涨的 20 世纪 70 年代，财产税征税率随之大幅提高，此时，政府却未能防范住房负担由企业向房屋所有人转移。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设施体系（中小学、大学、图书馆、道路及其他公共福利设施）质量正在下滑，但在过去，这些体系却堪称一流，加州人无不为此自豪。近 30 年来，加利福尼亚州所获的联邦政府拨款收入一直有限，因此，加州的多数公共设施质量不断恶化，只能和密西西比州一分高下了。加州人痛恨的是：房屋所有人需缴纳的房屋税，在 10 年间已经增长两倍，征税比率之高，使他们正面临断供的危险处境。于是，加州民众开始向两党领导人发难。此举无可厚非，但民间的讨伐之声，却被仇视政府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所利用，结果，保守主义势力大行其道。

从全美的层面来看，状况与加州的情形完全一致。政治家采用累进提高的税率和社会福利开支方式，为普通老百姓带来了经济利益，这种举措自然受到选民的支持。如今，政治上的保守派已成功地妖魔化征税举措和政府。他们不仅通过论证，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反复提及偶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抗税大叛乱”，以此说事。但是，针对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税率一直在提高，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下滑。不断增税的举措似乎并不是良策，现在，就连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也不敢挺身而出捍卫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在这种背景下，当普通工薪族和中产阶级经济窘迫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不会指望民主党人出手相救，甚或彻底对政治绝望。如果他们对政治还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当他们听到“说到底，我们所有人都得各顾各”这种论调时，就很容易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者或极端保守自由论者的牺牲品。

本书将深入探讨：在 1980 年后的时代，民主体制对金融精英的制衡，是如何式微的；金融精英主导政治之后，又是如何避免公开辩论的限制而危害美国公民，从而使美国局势无法改观的。美国将何去何从？本书将为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深入分析应对方案。

本书分四大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第二章探讨调控型经济及其式微问题：曾给美国带来整体繁荣、发展机遇并提供经济保障的调控经济，是如何被金融精英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将为我们描述政府逐步取消对金融监管的政治态势，并为我们呈现这样的事实：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和我们面临的更大整体风险，说到底都肇始于政治因素。第七、第八、第九章将从全球视野分析全球化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的调控重任一如政治和经济那样艰难。最后两章将深入分析美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美国政治未能急大众之所急，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利益？本书最后乐观地指出：根植于大众的政治和经济策略，可为我们的调控型资本主义形式重新注入活力，从而减少整个系统和个人面临的风险，实现社会的整体繁荣，让民主机制重现生机。